

志道与游艺：文学研究的两种路径

□ 廖可斌

“志道”与“游艺”，典出《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本意是指一种较为理想的人生境界，或曰较为理想的人格培养模式。我姑且借用这两个概念，阐述文学研究的两种路径。

“志于道”和“游于艺”：“为人生的文学”和“为文学的文学”

所谓“志于道”的研究路径，就是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关系，重视文学艺术如何反映社会人生，又如何作用于社会人生；追求为社会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游于艺，则强调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强调文学艺术本身的特征，即文学艺术之所以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重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形式、技巧，特别是语言、结构等；追求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

陈寅恪先生（1890—1969）与钱锺书先生（1910—1998）的学术研究旨趣存在差异，多年来广受关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此有各种解读。我认为，文学研究有“志于道”和“游于艺”两种路径。陈先生与钱先生的分歧，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文学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简而言之，前者偏重于“志道”，后者偏重于“游艺”。

陈寅恪：强调文以载道、知人论世

陈寅恪先生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钱锺书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两位先生都和清华有渊源。按过去20年为一辈的说法，钱先生应为陈先生晚辈。钱先生在国内外公场合和私下交流中，曾多次表示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以为然，似未见陈先生对此作过回应。

关于钱先生与陈先生学术上的分歧，汪荣祖《槐聚心史》和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的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学术交集之意义》中，记录较详。最新披露的材料，是《钱锺书师友札记》中钱先生来信云“见刊物载寅翁兄比与自言，（按应为‘弟’之笔误，钱先生自指）‘最佩服陈寅恪先生’，读之骇笑……寅恪先生在清华时，兄（弟）未尝旁听其任何课……”反右前，忽得陈先生一书，兄（弟）敬报而已。陈先生学问自成一家，但兄（弟）生平开径孤行，未尝心欽之也”。

钱先生对陈先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



几个问题上。一是关于陈先生的《韦庄（秦妇吟）校》。唐末五代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是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长篇叙事诗之一。我们不可只知道《孔雀东南飞》，而不知道它。该诗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反映唐末五代混乱悲惨的社会现实，其现实主义精神不亚于杜甫《三吏》《三别》。陈寅恪先生认为该诗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写照，且文笔生动，极具价值，故专门作《韦庄（秦妇吟）校》长文，进行详细校勘和考证，探讨唐末历史事件及社会背景。

钱锺书先生则认为，《秦妇吟》是一首诗，陈先生把它与历史联系并证明其记载史实如何准确细致，没有意义。诗是诗，历史是历史，若《秦妇吟》只是完整记录历史，即附属于历史，便没有真正的文学价值。

二是关于陈寅恪在其代表作《元白诗案》中，对杨贵妃入宫时是否为处女，做了大量细致的考证。钱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容易引发人们的兴趣，所以钱锺书先生在数个场合都提到过，以此为例批评陈先生史学互证的研究方法。那么，陈先生此举，真属无聊，或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吗？显然不是。白居易《长恨歌》写杨玉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意谓杨玉环成为唐玄宗妃子之前，未曾出嫁，这是作为唐朝臣子的白居易为本朝皇帝后妃避讳。杨玉环在成为唐玄宗妃子之前，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史籍中有线索可寻。陈寅恪先生通过大量考证，弄清真相，是借此细节来观察整个唐王朝文化的一个重大特点——李唐皇族很可能具有少数民族血统，他们对父子男女伦理不太计较。而古代君王的行为对整个朝廷、整个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陈寅恪先生研究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严肃的历史文化问题，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另外，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李华党争”是两种文化之争，钱先生认为这是过度阐释；陈先生通过对白居易《卖炭翁》中“回车叱牛牵向北”的研究，考证唐朝官制格局，钱先生则认为，文学主要出于想象，不应把它当成地理解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陈寅恪先生晚年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巨大



困难，写成鸿篇巨制《柳如是别传》，钱锺书先生则认为陈先生耗费巨大精力为一个妓女作传，难以理解。

近三十年前，我阅读《柳如是别传》时，受到巨大震撼。我完全接受陈先生的观点，认为柳如是确为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曾为歌姬，但出身非她所能选择。她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身处如此卑微的境地，她没有沉迷其中，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学习，变成一个如此有才华、有见地的女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主动抗争，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抗清复明、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保护家人的生命财产等方面，深明大义，慷慨壮烈，不惜舍身生命。试问世上几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出身高贵不值得敬佩，出身低贱的也不应受到歧视，关键在他或她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是否能坚守一些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柳如是确实堪称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个大写的人。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关重要，决定了一个人以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而他看到，从晚清以来，太多的人蝇营狗苟。他就是要通过表彰柳如是的人格和气质，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因此，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写作此书，是经过认真思考后做出的慎重选择，是有很大寄托付诸其中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陈寅恪〈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旨趣》，专门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总之，陈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强调文以载道，强调文学研究应该知人论世，关注文学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强调文学研究以至整个人文学研究应该有世道人心之忧。

钱锺书：文学语言自具奥妙 同时强调“史”可有“诗心”

钱锺书先生的文学研究方法，则偏重“游于艺”。他较为重视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认为人类作为有思想情感的动物，不能没有文学，文学的价值就在这里。

至于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奥秘是什么，钱先生认为答案主要就在文学语言本身。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不同于历史、哲学等，就在于它们所用的语言不一样。哲学、历史都力求语言的精确，科学技术就更不用说了。而文学的语言必须运用隐喻，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并不对应，存在复杂微妙的关系。钱先生涉猎极为广博，但他的研究方法非常专一，而且一以贯之，就是运用语义学、比较修辞学的方法研究文学，通俗地说，就是研究不同语言的文学如何表达同一个意思，由此观察不同语言和民族文化的特点。

美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艾·瑞恰兹1929年—1930年任教于清华大外外语系，钱先生则在1929年考入该系。瑞恰兹将语义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认为文学的奥秘就在于语言，文学语言的特点就在于隐喻。他后来成为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和文本细读研究方法的鼻祖。影响很大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也是承这一脉而来。只是该书作为教科书，力求传统文学理论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平衡。它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说起，后面部分则侧重于讲文学的形式因素，认为文学就是“由特殊的语言按照特殊的结构组成的东西”，这句话可视为全书的总纲。钱锺书先生应该受到瑞恰兹的影响，但他从未明确谈到这一点。钱先生1933年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当时瑞恰兹的理论在英国如日中天，钱先生也有可能再次受到影响。

钱先生特别强调文学的独立性、特殊性，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力主划清文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界限，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他曾反复抨击中国传统的“诗史”概念，认为文学自有独立价值，不应该以是否有历史价值来判断文学的价值。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诗史”是最了不起的，倘若讲一个人的作品带有“诗史”品格，就是最高评价，但钱先生非常反感这种观念。他在《管锥编》中说：“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在《宋诗选注序》中又说：“‘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站在文学的立场，钱锺书先生不仅反对强调诗中有史，反而强调“史”可有“诗心”。在《管锥编》中，他借刘知几《史通》之说，强调“史有诗心，文心”：“刘氏《知几》复终之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则是史是诗，迷离难别。老生常谈曰‘六经皆

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史如诗，求诗于史乎。惜其跬步即止，未能致远入深。”钱先生这种说法也有道理。如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说《史记》不仅记载了历史事实，而且蕴含了价值观和情感。

两种文学研究方式的启示意义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钱锺书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批评？陈、钱两位先生文学研究方式之区别，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留学日本、美国、欧洲十几年来，他并非不懂西方文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在他留学哈佛大学时，哈佛的“口传文学”理论方兴未艾，强调根据口传文学的独特规律来研究口传文学，不能用书面文学的眼光看待口传文学。陈寅恪先生借鉴这一理论，对《再生缘》这部弹词作品做了全新的研究，为中国俗文学研究树立了难以企及的典范。由此可见，他对西方文学研究方法非常了解，并能合理运用。他之所以在具体研究工作中，侧重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强调知人论世，有文史互证，恰恰是他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有准确把握、对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差异有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和选择。

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与西方不同，导致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与西方不同。中国长时期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君主需要很多有知识的文人帮助他管理辽阔的国家，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中国古代的“文人”不等于西方的“文学家”，他们不满足于创作文学作品，其人生目标首先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参与政治，致君泽民，光宗耀祖，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因此他们特别关心现实，尤其关注政治。他们通过创作文学作品反映现实，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希望以此作用于社会现实。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关系极为密切。

西方长时期实行分封制，每个诸侯国都较小，君主不需要别人帮助他管理国家，靠自己及亲属、管家等就够了。所以西方没有“士大夫”这样一个群体。西方文学家没有机会参与政治。他们的作品主要写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写爱情、幻想等，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稀薄。他们主要关注如何把故事、情感写得精妙动人，所以西方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形式、技巧等特别重视。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关注社会现实，尤其关注政治，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这是中国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特点所在，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传统特征。研究中国文学，就不能照搬西方文学的研究方法，而必须尊重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在，注意考察其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其内涵，挖掘其价值。

陈寅恪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式多种多样，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主要的、根本的方法，还应该是知人论世的方法，这是由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基本特点决定的。这种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主道、大道、正道。西方文学理论是根据西方文学的特点总结出来的，它更符合西方文学的实际。我们应予以借鉴，但如果将之简单照搬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上，甚至把它当作主要的研究方法，势必本末倒置，似是而非。

但钱锺书先生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对文学本身的形式、技巧特别是语言的研究，也有深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文学必须首先是文学，否则再有价值，也不属于文学。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理论，过于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的关系，确实有可能使文学失去独立地位，使文学变成历史、政治、伦理的附庸，使文学变成非文学。鉴于这种教训，钱锺书先生反复强调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点，对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法保持高度警惕，并非没有道理。

因此，我们也要理解钱锺书先生的观点的内在合理性，加强对文学本身的研究，矫正中国文学过于政治化、伦理化、历史化的弊端，重视对文学的形式、技巧、语言的研究，弥补历来中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而且，受钱先生学术观点的启发，我们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从南北朝的沈约、萧统到明代的李东阳、杨慎、前后七子、陈子龙、竟陵派，再到清代的阮元等，都有许多注重探讨文学的独立地位、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特征的理论。只是在强大的“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传统的笼罩下，它们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成了“扶掖的低音”。

综上所述，我认为，陈先生偏重“志于道”的研究范式，与钱先生偏重“游于艺”的研究范式，完全可以并存，而且彼此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张力。

当然，具体到钱先生对陈先生的批评，包括其批评方式，那又是另一回事。我始终不能理解，以钱先生的渊博和睿智，何以不能理解陈先生文学研究方式的深刻合理性，不能理解陈先生一系列研究成果的丰富内涵和重大价值，不能理解“志道”与“游艺”两种研究方式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是追求学术研究的“片面的深刻”所致，还是个性使然？

作者简介：廖可斌，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史海探真

百粤归化，肇自韩年

谈韩愈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 张海鸥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他一生既波澜壮阔又颠沛流离。曾三次入粤，两任岭南地方官。

三入岭南

韩愈十岁时，曾随兄嫂迁居韶州两年。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说韩愈“早孤依嫂，读书日记数千言，通百家。”当代学者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引《新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大历十二年（777年，韩愈十岁）四月，“起居舍人韩会等十余人皆坐元载贬官。”《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李汉序：“先生……随兄播迁韶岭。兄卒，鞠于嫂氏。”

公元803年冬，韩愈36岁，在监察御史任上，上了两份奏疏得罪了权臣和皇帝。一是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而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实地考察后为民请命，上《论天旱人饥状》，遂遭李实等人构陷。二是“上疏极论官，德宗怒，贬阳山令。”（《新唐书韩愈传》）他于804年二月到任，次年四月离开，在阳山十四个月。

初到阳山，韩愈很难适应。他在《送区册序》开头说：“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横波之石……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茅茨竹屋，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说不相通，画地为牢。”（《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一）

但韩愈把阳山当作自己践行仁政爱民思想之地，他整顿政务，传授中原的农耕技术，重教兴学，宣传儒家仁义礼智思想，使阳山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文明开化。明代冯大受《祭韩文公》云：“百粤归化，肇自韩年……人诵诗书，家安礼席。”这话不能当作史实来读，但其意可会。冯是用祭语体强调韩愈对岭南文化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在人类文化史上，每一位文化伟人的到来，都或多或少影响一地文化之提升。韩愈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对阳山的影响都具有里程碑意义。韩愈805年四月离开阳山，后人



韩愈画像 图/视觉中国

各种纪念：“百姓多以公之姓名其子”，文教传统延续，宋代建有学宫，明代建明伦堂、仰止书院，清代有阳溪书院、回龙书院、宗韩书院、桂香书院、读书山堂、通儒社学、淇潭社学等。今天的阳山，有多达50多处纪念韩愈的文化景观，如贤令山、贤令湖、读书山、仰韩亭、韩愈路、韩愈纪念馆、韩愈文化公园等。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韩愈上《论佛骨表》劝谏，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时年52岁的韩愈二月到任，十月离开，在潮州八个月，做了一些利民之事，比如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耕作技术，祭鳄鱼，赍放奴婢，兴办教育等。他带头募捐，捐献自己的大部分俸禄：“刺史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供学生厨费”。他走后，“潮州山水皆姓韩”，体现了人民对韩愈的敬重和纪念。

文化丰碑

韩愈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对岭南的影响既在一时一地，又在久远。具体可概括如下诸端。

一是文化领袖。他倡导古文运动，主张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过分推崇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文。韩愈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文章体皆备，独树一帜，气势雄健，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别开生面，造语精奇。如《进学解》写别开生面之情，又论选士之道，其中业精于勤、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提要钩玄、焚香燃蜡、网中肆外、啼饥号寒等，都成为常用成语。

二是教育家。他一生重视教育，尊儒崇学。曾三进国子监做博士、祭酒，传道授业解惑。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继承儒学道统，重新阐释儒学，开宋明理学

之先声。其《师说》《进学解》等文章阐释了丰富深刻的教育理念，堪称伟大的教育思想家。

三是国士。他关心国计民生，既有独立思想，又“发言真率”“鲠言无所忌”。如《论佛骨表》说其实是群臣不敢说的真话。《请解》为李贺鸣不平：“与贤者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得进士为是。”韩愈怒驳：“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他一生为人处世堪当士人师表。

四是政治家。韩愈反对藩镇割据，多次参与平定藩镇割据，作《平淮西碑》歌颂平叛胜利，赞扬平叛战，批评主和派，表述反对藩镇割据的政见。他许多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他一生有许多可称道的政绩。

五是史家。他参与撰写《顺宗实录》五卷，敢于秉笔直书，是称职的史官。

韩愈有关岭南的诗文

据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巴蜀书社1999年8月第一版），韩愈在岭南所作及与岭南相关的诗文大约70篇。其中在阳山所作诗大约14首，文5篇。元和十四年赴潮州至离开潮州，近一年之内作诗35首，文12篇。此外元和十五年任袁州（今江西宜春）作《南海神庙碑》。

这些诗文是韩愈在岭南生活最直接的文化遗产，不仅记录了他对阳山、潮州以及岭南各地的观感和心悟，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思想和意志。比如他在阳山的《县斋读书》诗：“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事，避道得初心……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注者说：阳山穷处，但有区册、区弘、窆存亮、刘师命等皆自远方来师从韩愈。不论在阳山还是潮州，韩愈都兴文重教，言传身教，化育一方。他虽然政治上排佛，但在文化理念上也尊重和理解佛教，与佛门文士友好交往，在阳山有《送惠师》《送灵师》等诗作。他在潮州作《祭鳄鱼文》并序，是效仿前贤孔子、祭豕等借诗抒怀之作。琴操就是琴曲歌词。韩愈《琴操十首》借孔子周公等圣贤故事，自写胸臆。其前三首《将归操》《箕操》《龟山操》写孔子怀才不遇故事，另七首分别写文王、周公、尹吉甫、牧犊子、商陵穆子、曾子等，都是不遇或离别的故事。比如《箕操》至今还是热门曲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录孔子《箕操》：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有定处。时人闇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孔子感慨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无可奈何但又坚守初心。韩愈效仿孔子作《幽兰操》：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日以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覯。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软件学院教授）

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也是写清高孤傲、怀才不遇、孤芳自赏。

现代作曲家赵季平创作琴曲《幽兰操》并略改歌词，是多年来高校音乐专业师生最喜欢演唱的曲目之一，幽雅清雅，很适合修身养性，涵泳气韵，练习琴艺和演唱技巧。

韩愈在潮州的《祭鳄鱼文》是奇妙之文，其意蕴很多，耐人寻味。刺史是一州长官，须尽忠敬业，为民除害，因而行祭祀之事，以明敬畏之心，恤民之意。韩愈若哭诉不灵“必尽杀乃止，其无悔。”表示除恶务尽的决心。但若联系韩愈当时的处境乃至生平之性情，还可推测体会到他似乎至用隐喻的方式表明人类面对邪恶的态度：果敢坚强，智慧抗争。也纾解仕宦逆境中的郁闷。

他离开潮州到袁州所作《南海神庙碑》也与岭南相关。这篇碑文详细记录了唐代广州刺史孔戣治理岭南的经历以及唐代祭海的习俗。碑文结构巧妙，想象奇特，语言精美。

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谪居惠州的苏轼应潮州知州王涤之请，作《潮州韩文公碑》高度评价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

公元824年韩愈病逝于长安，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北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从祀孔庙。韩愈两次在岭南为官，时间不过两年，但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是不能仅用两年和几件事来衡量的。他是名满天下的文化伟人，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其文化意蕴如潮如海，丰富博大，时人和后人不断阅读他，阐释他，接受他的影响润化。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软件学院教授）